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哲学基础研究述评

汪信砚

摘 要:以往人们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习近平治国理政哲学思想的研究,其内容主要涉及习近平治国理政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唯物史观的坚持和运用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其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研究范式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研究内容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和深刻性,某些重要问题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当前及今后推进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研究,应该牢牢把握以下重要着力点:一是从根本上转换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研究范式,二是大力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整体把握,三是深入推进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创新的探讨,四是多维度地拓展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的研究。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18)01-0005-1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逐渐形成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得到明确概括和系统阐述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关内容作了解读和研究。其中,尽管国外学者也就此出版和发表了不少论著,但它们基本上都没有涉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与此不同,国内学界则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当前,对以往学界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研究作一回顾和反思,揭示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明确应该努力的方向,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推进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研究,深化人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增强人们坚持、贯彻和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自觉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以往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研究的基本内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的系列重要讲话中所体现出来的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总结。以往人们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习近平同志的系列重要讲话所阐述的治国理政思想的哲学意蕴亦即习近平治国理政哲学思想的研究,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的研究

十八大以来,许多人在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哲学思想时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习近平治国理政哲学思想与历史上相关思想资源之间的传承关系,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习近平治国理政哲学思想的理论来

源。人们认为,从总体上看,习近平治国理政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习近平治国理政哲学思想的基本来源。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两次专题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习近平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原原本本地学习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强调党员干部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强调治国理政需要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滋养;强调全党要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能力,是对我们党的光荣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这些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作用的深刻认识和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治国理政实践的高度自觉。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之所以有这样的哲学自觉,主要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中的重大作用的深刻认识^[1]。

其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智慧是习近平治国理政哲学思想的又一重要来源。习近平强调“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很有益处”^[2];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与基因,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是中国国家形象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独特标识以及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深厚渊源,并曾多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作过概括。习近平所概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中,很多内容都属于哲学智慧,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等等。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蕴含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深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哲学智慧的滋养。例如,习近平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和而不同”“世界大同”“协和万邦”等思想的继承和运用。

(二)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坚持和运用的研究

为了更具体地阐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治国理政实践的高度自觉,人们聚焦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坚持和运用,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意蕴。人们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坚持和运用或其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意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习近平同志的系列重要讲话紧紧抓住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客观实际,立足于我国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征,着眼于解决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改革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其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既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求真务实的作风,又重视意识的能动作用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号召全党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既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强调以“行”促“知”和在实践的基础上促进理论创新,又重视以“知”促“行”和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强调“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和必须加强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深刻理解和自觉运用。

任福全、何中华等人还特别强调,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所坚持的是一种实践唯物主义。其中,任福全等人认为,实践唯物主义主张实践是认识和真理发展的根本基础和动力源泉,要求人们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追求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就是永无止境的实践发展、追求真理和理论创新的产物,它“实现了实践唯物主义在中国的新飞跃——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有机统一”^[3]。何中华等人则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生动地体现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首先,实践唯物主义为“中国梦”提供哲学基础和合法性依据;其次,实践活动塑造并建构着我们的“此在”性,而习近平所说的“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就是我们的“此在”性诉求;再

次,实践的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和要求;第四,对中国文化秉持“活起来”的态度,体现着实践本身所固有的能动参与姿态^[4]。

(三)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唯物辩证法的坚持和运用的研究

在以往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哲学思想的研究中,人们高度重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哲学方法论,比较详细地探讨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唯物辩证法的坚持和运用。人们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坚持和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形成了并体现出深邃的哲学思维:(1)战略思维。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国家安全观、“一带一路”建设构想、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都体现了这种战略思维。(2)系统思维。习近平善于用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注重把握事物的整体联系。例如,“四个全面”布局就是系统思维的产物,它确立了中国现代化近期的一个战略目标和三大战略举措,实现了战略目标与实现路径的有效对接;同时,它注重治国理政各因素间的耦合,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全面性、整体性及协调性要求。(3)历史思维。习近平善于把事物置于历史长河中考察,通过总结历史规律来分析现实问题,研判事物发展的未来趋势。例如,他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前进方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党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党和国家的光明前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性等问题的分析和阐述,无不体现出这种历史思维。(4)辩证思维。习近平始终坚持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准确判断并科学分析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十个指头弹钢琴,牵住“牛鼻子”谋发展,科学统筹“两个大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表现出炉火纯青的辩证思维艺术。(5)创新思维。习近平善于运用创新思维来思考经济发展方式和动力转变问题,强调创新发展是国际竞争的大势所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强调创新能力是国际关系中最核心的竞争力和国家硬实力的体现;强调创新是牵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并努力构建有利于创新的机制体制。(6)底线思维。即牢牢把握底线,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对自身最为有利的战略选择,这是对量变与质变辩证关系原理的创造性运用。习近平强调守住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底线,坚持两个“必须毫不动摇”;强调保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定力,不走“邪路”和“老路”;强调坚持文化体制改革的价值引领,“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强调在社会治理中坚持以人为本,“伤害无辜群众就是触碰底线”;强调恪守生态建设的红线,“不能越雷池一步”;强调加强党的建设要严字当头,“对腐败零容忍”等等,都是底线思维的具体体现。

韩庆祥等人还用“战略辩证法”来概括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战略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历史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他们认为,习近平是一位战略家,在治国理政问题上,他特别注重从战略上进行思考和谋划,并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来处理战略实践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关系。“战略辩证法,指的是在战略谋划和实践中运用辩证法,或把辩证法运用于战略谋划和实践中,在战略中有辩证法,在辩证法中有战略。”^[5]

(四)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唯物史观的坚持和运用的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史观与治国理政活动的关系最为密切,对治国理政活动的指导作用也最为显著。因此,人们都特别注重探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唯物史观的坚持和运用,其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的坚持和运用。一方面,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充分尊重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我国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其所提出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的战略步骤、“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等,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也特别重视社会意识的能动反作用;强调战略目标的引领作用;强调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作用;强调理想、信念的激励作用;强调顶层设计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作用;强调发展理念对促进发展的重大意义;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全体人民的凝聚作用,等等。(2)对社会基本矛盾辩证运动原理的坚持和运用。习近平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种整体来考察,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

动结合起来进行观察,提出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的重大战略判断;提出要根据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新变化不断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而没有完成时的重要论断;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而带动全面改革、推动我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重要论断;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总体目标、原则方针和实施步骤,等等。(3)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的坚持和运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强调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是我们各项事业力量的源泉;强调要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的权益;强调要坚持把实现好、发展好和维护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告诫全党要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请教和向智者问策,不断从人民群众中吸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五)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的研究

郝立新认为,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问题、阐释中国实践、解读中国道路,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哲学思想,包括立足中国现实、解读时代问题的实践哲学;关注群众利益、贴近人民生活的大众哲学;遵循客观规律、驾驭复杂局势的辩证哲学;聚焦现实矛盾、突出改革创新的发展哲学;饱含文化底蕴、彰显精神力量的价值哲学。它无愧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典范^[6]。韩庆祥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哲学精髓是“人民共创共享”。所谓“人民共创共享”,既包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包括经济领域的“共创”、政治领域的“共商”、文化领域的“共识”、社会领域的“共享”、生态领域的“共生”、国际领域的“共赢”、国家事务社会事务领域的“共治”。由于“共创”是共同创造财富,“共享”是共同享有财富,这二者具有根本性,所以,从“共创”“共商”“共识”“共享”“共生”“共赢”“共治”中可以概括、提升出“人民共创共享思想”。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人民共创共享”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成果^[7]。王雨辰等人认为,习近平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运用于考察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思想,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对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的重要性,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处理民族国家内部、民族国家之间人们在生态资源上的利益矛盾关系:首先,习近平认为,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公平正义的制度都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其次,习近平提出要进一步完善生态法律制度和法规,加强生态资源的管理;再次,习近平强调,要建立科学的生态补偿制度,使生态受损地区的权益得到合理保障;最后,习近平指出,鉴于当代生态危机全球化发展趋势以及全球性的气候危机,要加强国际合作,展开全球生态治理^[8]。王海滨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形成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良性互动的话语体系^[9]。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专门分析和研究了习近平治国理政哲学思想在用语方式上的民族化、大众化特点,认为这也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贡献。

除上述五大方面以外,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在解读和阐释十九大报告的过程中,人们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作了一些初步的解读,特别是注意到了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论断。人们认为,这是十九大报告科学判断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命题的客观基础,也是十九大报告所系统阐明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哲学依据。二是十九大报告突出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人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具体运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灵魂和主线。

二、以往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上述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研究是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关于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其中的某些研究相当深入,很有特色和理论深度,它们对于深化人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如果从总体上看,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由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才得到明确概括和系统阐述的,以往人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研究明显存在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或不足:

首先,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研究范式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

在以往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研究中,人们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即它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治国理政实践是有明确意识的。但是,人们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的理解是比较片面的;似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只是应用、甚至只是照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原理或观点;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能够现成地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正是从这样一种片面理解出发,人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的研究大多是贴标签式的,其关注的重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各个方面的内容分别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何种原理或观点。这种贴标签式的研究范式是一种教条主义的研究范式,它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也有悖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恩格斯早就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0](P742-743)在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时,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或观点的体现上,把目标定位于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各个部分的内容都贴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原理或观点的标签,显然是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和观点视为“现成的教条”的表现。实际上,决不能简单地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理解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或观点。且不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或观点的“体现”本身有自觉与不自觉之分,即使是自觉地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或观点,也仍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或观点视为教条之嫌。习近平同志强调,全党要深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思想精髓,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要自觉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提高辩证思维能力、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和驾驭全局能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鲜明地体现了这些要求。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绝不是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或观点”所能概括得了的。

以往人们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各个方面的内容分别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何种原理或观点的贴标签式的研究范式上,不过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盛行的教科书范式的一个变种。这种教科书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原理或观点寻找各种实例,以求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或观点的普遍适用性。而之所以说上述贴标签式的研究范式是教科书范式的一个变种,就是因为,虽然它不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或观点寻找实例,却是从实例出发寻找与之相对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或观点。换言之,它实质上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当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或观点的一个实例。正如教科书范式必然把教科书体系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或观点看作是自足的一样,满足于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各个部分的内容都贴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原理或观点的标签的研究范式,是不可能看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创新的,因而也是难以真正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的。

其次,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研究内容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

以往人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研究是相当零散、很不系统的。一方面,这类研究大多是结合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某一或某些方面的内容来进行的,似

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各个方面的内容之间是相互隔离、彼此无涉的。例如,人们分别探讨过习近平的“中国梦”思想、经济“新常态”思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思想、人民主体地位思想、文化强国建设思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的哲学意蕴,从其中很难看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这些不同方面的内容之间有何内在联系,它们给人的印象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不同方面的内容有不同的哲学基础。另一方面,这类研究又往往是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定领域(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等)来展开的,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内容之间是相互独立、漠不相关的。例如,有人探讨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关于当前我国历史方位的判断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意蕴。他们认为,习近平强调“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点”,体现了一切从变化了的实际出发、牢牢把握基本国情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要求,是唯物论的当代运用^[11]。有人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其中,“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总体谋划和重点突破相统一”等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联系和系统观点,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12];五大发展理念科学解答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破与立”“内与外”“点与面”“上与下”等问题,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辩证法^[13]。因此,虽然以往出版和发表了很多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论著,但即使把所有这些论著都汇集在一起,也难以使我们形成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完整印象,大多数论著甚至也根本没有试图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作出总的概括。

以往人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零散研究和碎片化理解,是前述那种贴标签式的研究范式的必然结果。正是为了便于贴标签,人们各取所需地随意抽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不同方面的内容,在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关内容作了一番比对之后,便断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某一方面的内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或唯物史观的某个原理或观点。可以说,倘若人们继续按照那种贴标签式的研究范式来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无论人们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实现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全面研究和整体把握。

再次,尚未揭示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深刻内涵。

以往人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研究不仅很不系统,而且大多也很不深入,显得比较平面化,甚至表面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视界比较狭窄。一方面,大多数研究都缺乏世界视野,都只是依循当前中国实践的需要来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持和运用,而基本上无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当代世界大趋势的哲学回应和当代世界文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滋养。即使是在对习近平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具有鲜明的世界性、集中体现时代精神的思想进行哲学解读时,人们往往也只是专注于它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大多数研究也缺乏历史眼光,都只是立足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来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哲学解读,而很少关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历史经验的哲学总结,更没有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探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二是思路比较封闭。在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时,许多人往往拘泥于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中的个别论断甚至个别词句,并仅就这类个别论断或个别词句来讨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意蕴。例如,在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哲学智慧的关系时,人们一般都专注于解读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中的各种传统文化用典,而没有从整体上考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哲学智慧的继承、运用和发展;在

讨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时,人们所重视的一般也只是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中的有关论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原理或观点之间的对应关系,而没有从总体上考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坚持、运用和发展。三是方法比较粗鄙。以往许多以“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中的哲学思想”“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意蕴、哲学根基等等)”为题的文章,都只是简单罗列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或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所内含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的有关原理和观点。有人甚至开列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五大哲学基础”,包括“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笃行重效,一切从实际出发”“牵住‘牛鼻子’,把握和解决矛盾”“把握战略机遇,推动动态优化”以及“树立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系统地认识和解决问题”^[14]。这种简单罗列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原理和观点的做法,造成了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研究上的大量低水平重复。以上述这样的视界、思路和方法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注定是不可能揭示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深刻内涵的。

最后,有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某些重要问题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如果从上述贴标签式的研究范式出发看问题,以往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研究似乎是很全面的,因为它已经涉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的坚持和运用以及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哲学智慧的继承和运用等各个方面。其实不然。

一方面,以往人们对于有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某些重要问题的探讨是很不充分的。在这类问题中,最为重要的当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创新。应该说,某些研究者是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就此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的。例如,正如前述,有人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创新成果概括为“人民共创共享的哲学”,还有人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创新成果是实践哲学、大众哲学、辩证哲学、发展哲学和价值哲学的统一。但是,人们并未具体、深入地考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创新是如何实现的,因而并没有清晰地阐明这种哲学创新何以能够促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创新,亦即这种哲学创新的成果何以能够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论断,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根本理论基石之一,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理论创新。虽然近期人们关于十九大报告的解读已经注意到这一重大论断的突出重要意义,但还没有对这一重大命题的丰富内容和深远意义展开真正深入的研究。

另一方面,有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某些重要问题至今仍未为人们所探讨。在这类问题中,最为重要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创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推进。在以往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研究中,虽然也有人论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创新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但由于其没有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创新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予以考察,因而遮蔽了许多本应深入探讨的问题。例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如何承继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的,它从哪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的哲学思想,它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关系如何,它是如何实现对新时代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的,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哪些新鲜经验等等,这些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几乎都没有涉及。不对这些问题作深入的研究,是不可能真正阐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创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推进的。

三、推进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研究的重要着力点

以往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研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向当代中国实际、自觉服务于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表现。虽然以往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研究中存在着如上所述的各类问题,但是,我们指出这些问题并不是要否定以往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研究的意义,而是为了克服这些问题,进一步推进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研究。事实上,上述那些问题也只有通过进一步推进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研究才能得到克服和解决。根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的性质和特点,并结合以往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研究的内容和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当前及今后推进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研究,应该牢牢把握以下重要着力点:

第一,从根本上转换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研究范式。

正如前述,以往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研究所遵循的是一种贴标签式的研究范式,其关注的重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各个方面的内容分别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何种原理或观点,这种教条主义的研究范式根本不符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态度,导致了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的碎片化理解。要推进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研究,首先必须从根本上破除这种研究范式,确立起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具有本质一致性的研究范式,这就是毛泽东早就强调过的“有的放矢”或“实事求是”的研究范式,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15](P80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就是这种“有的放矢”或“实事求是”的态度,习近平之所以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领导干部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就是为着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找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的本质内涵。要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揭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也必须遵循这种“有的放矢”“实事求是”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上,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思考和破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问题上。例如,对党的十九大报告所作出的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论断,我们不应该像以往那样以贴标签式的研究范式来看待它,局限于阐释它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矛盾特殊性原理,而应着力于探讨和阐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如何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特殊性原理而深刻地分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第二,大力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整体把握。

以往人们以贴标签式的范式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造成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哲学基础的双重碎片化理解,即既没有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来对待,大多只是探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内容的哲学意蕴,也没有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作整体

性的探讨,所关注的往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特定内容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定原理或观点。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则要求我们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哲学基础都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作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作了系统回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毫无疑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不可能自然地、现成地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只能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新时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它可以被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实际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理论体系的每一部分内容都内在地贯穿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新时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它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各种问题的思考和回答都综合地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本身也是一个有机的理论整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当前及今后推进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研究,就应该大力加强对作为一个理论整体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研究。

第三,深入推进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创新的探讨。

既然以往人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研究大多是贴标签式的,其所关注的重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特定内容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定原理或观点,因而它必然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实现的哲学创新。虽然有人也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哲学思维上的创新作过一些很有价值的思考,但其所探讨的仅只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个别领域或个别观点上的哲学创新,很难想象这类个别领域或个别观点上的哲学创新能够支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理论创新。实际上,作为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的宝贵结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创新首先是哲学理论基础上的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创新成果,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四个重要方面:一是求真务实论,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唯物论基础;二是知行合一论,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铸中国传统文化而实现的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哲学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论基础;三是战略辩证法,它是由战略思维、历史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精准思维、底线思维等构成的有机系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吸取中国传统哲学中辩证智慧的基础上对于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方法论;四是人民主体论,它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重民、贵民、爱民、养民、恤民、安民、亲民、惠民、利民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唯物史观基础。上述四大方面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凸显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鲜明的创新特色,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理论创新提供了根本保障。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

基础,必须深入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实现的哲学创新,特别是必须在全面、具体考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哲学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深入解读和系统阐述上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四大方面的创新内容。

第四,多维度地拓展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的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新时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突出的重要贡献。当前及今后推进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研究,必须注意从以下维度大力拓展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的研究: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的继承和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是由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创、由毛泽东正式奠定的,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传统,并成功地塑型了现代中国哲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继承和推进了这一重要传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丰富和创新了这一传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许多新鲜经验。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必须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阐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的推进,特别是它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基础的丰富和拓展。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哲学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在地包含和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相结合,总结、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文化遗产。习近平非常重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处处都浸润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智慧。要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必须花大力气系统考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到底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了哪些哲学智慧,深刻阐明它是如何实现对这些哲学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的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是我们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应有范式,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本身的研究范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创新体现了对这一研究范式的创造性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就是创造性地运用这一研究范式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必须具体考察其在各有关问题上对这一研究范式的创造性运用及其对新时代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启示。四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对新时代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持续不断地探索 and 求解“中国向何处去”即中国走什么道路的时代大问题,由此创造和不断发展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成为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和拓展的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哲学引领,因而是新时代中国道路的鲜明的哲学表达。要全面地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必须探析和阐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对新时代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特别是其对中国道路既往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和对新时代中国道路的哲学引领。

参考文献:

- [1] 林妙.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哲学智慧探析——从辩证唯物主义部分管窥. 理论研究, 2017, (3).

- [2] 习近平. 在中央党校建校 80 周年庆祝大会暨 2013 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2013-03-03.
- [3] 任福全, 薄利惠, 白晓帅.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哲学基础探索. 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7, (2).
- [4] 何中华, 郝书翠.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哲学意蕴. 东岳论丛, 2017, (3).
- [5] 韩庆祥, 张健. 新时期治国理政的哲学基础: 战略辩证法. 光明日报, 2016-01-13.
- [6] 郝立新.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典范. 人民日报, 2016-03-30.
- [7] 韩庆祥. 治国理政之道: 人民共创共享共治. 人民论坛, 2017, (23).
- [8] 王雨辰.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其重要意义.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7, (4).
- [9] 王海滨. 治国理政新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前线, 2017, (1).
-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1] 田长生.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哲学基石. 学习论坛, 2017, (7).
- [12] 杨卫军.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哲学底蕴. 学习与实践, 2016, (8).
- [13] 李宏国. “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透析.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7).
- [14] 彭劲松.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五大哲学基础. 理论导报, 2017, (9).
- [15] 毛泽东选集: 第 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A Comment on the Research of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New Era

Wang Xinyan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ast research of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New Era mainly manifests as the research of Xi Jinping's philosophical thought on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The basic contents of the past research deal with the theoretical sources of Xi Jinping's philosophical thought on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ts persistence and application of Marxist materialism, dialectic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ts contributions towards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e problems and defects of the past research manifest in the serious dogmatic tendency of its research paradigm, lacking systematicness, integrity and profundity in contents, and ignoring some important issues. Carrying forward the research of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New Era, we should firmly grasp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points: firstly,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New Era; secondly, energetically strengthen the overall grasp of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New Era; thirdly, push forward in depth the inquiry on the philosophical innovation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New Era; fourthly, multidimensionally expand the research of the contributions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New Era to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New Era; philosophical basis;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 收稿日期: 2018-02-09

■ 作者简介: 汪信砚, 哲学博士,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教授,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湖北 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 涂文迁